

2013年2月3日，著名摄影家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邓伟因癌症病逝，年仅54岁。

20世纪80年代，邓伟拍摄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《中国文化人影录》，开拓了名人肖像摄影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，被海内外誉为“为中国完成了一项文化工程”。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，他完成环球世界名人拍摄计划，以独特的视角刻画出百余幅世界杰出人物的肖像作品，足迹遍及五大洲，笔记百万余字，被誉为“人类摄影史上的创举”。

要特别提出的是，《水木清华》杂志在发展过程中，得到了邓伟教授许多支持和帮助。继2011年接受本刊专访后，他又多次发来他在国外拍摄的札记和照片，并就杂志的发展、排版等方面认真给出建议和指导。而今斯人已逝，唯余感念！

邓伟：一生只做一件事

○ 孙小宁

“人，出生的这天，就决定了人的死。人，活在世上都是有一定的定数的，只有长短不同而已。我感觉值得庆祝的不是自己的生日，而是在生命历程中，为了事业战胜困难经受住挫折以后的时刻，并非取得成功之后的庆祝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庆祝自己战胜了失败，那才算是对自己的衷心的庆祝。做到这一点不容易。”

——1992年4月13日日记，这一天也是邓伟的生日

2013年2月3日，中国的腊月二十三，俗称小年。这一天，我无知无觉，只在家平静度过。2月4日立春，单位组织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茶话会，有节目表演也有抽奖，内容很丰富。可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接到一个短信，一瞬间，竟然觉得这是个误发的消息。怎么可能，一个像他那样的人病逝，怎么可能没有什么预兆？“就在昨天离世，你可以去微博搜搜”。发短信的人回我。

单位的活动很喜乐，大家乐，我也跟着乐。但低头看手机，又瞬间泪湿眼眶。时哭时笑，荒诞如这个世间，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完该参加的活动。此时手机上的微博，这个消息已经在广泛转发，来自他曾经的同学、他所教的弟子。我已确信这一切是真的：摄影师邓伟，真的离开了人间。谁说的没消息就是好消息？我突然感到，人与人之间，一段时间的没消息，很可能是在酝酿更大的坏消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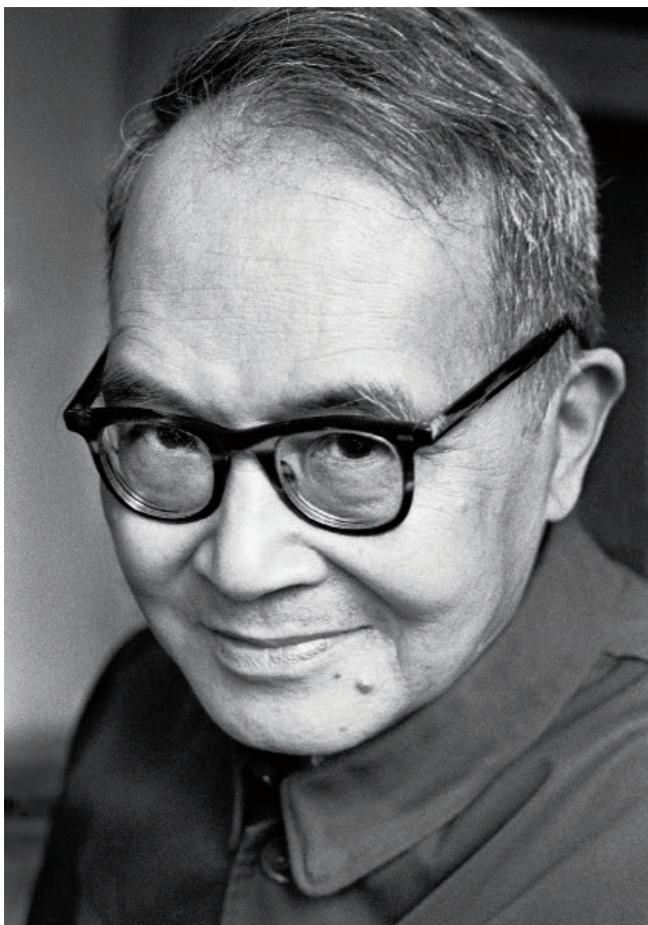
“肺癌，他不让说，也一直在封锁消息，他不愿意别人去看望他。”很快我又从一位知情人那儿得到他离世的最基本的事实。我那时拼命在想，我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。



邓伟工作照

应该是去年，去年的六月吧。我那时正在筹备伦敦奥运的文化版面。我能想到的作者中，排在第一的当然是邓伟。这些年，他旅居英国，拍了不少伦敦的照片。每次因为他出书，我们都有一次相见。对于我这样长年做图书版面又和他相熟的编辑来说，他原本可以打个电话，然后用快递的方式将书交给我，并且知道我会认真对待。但他仍坚持见面，“好久没见了，见面聊聊，地点你来挑。”这样的电话相约，几乎贯穿于他1999年后的每一本书的出版，而我之所以一口答应，也因为，每次他的出现，都如一面镜子，能照见我做事的疏懒与倦怠。我指的是就梦想的实现而言。

邓伟珍视梦想，所以你只要说一个愿望，他都会鼓励你努力去实现它。而与他交往这么多年，我只见他踩着坚实的台阶，一步步向梦想迈进，而我



钱钟书（邓伟作品）

和他聊天说起的许多想法，都好像被平庸的生活挤压磨碎。执拗、认真，务实，而又谦虚，是我对他始终如一的印象。没有改变，甚至包括旅英多年，已经能用英语顺畅地与人交流，但我看到的，仍然是一个有着老北京底子的邓伟，知礼又知面，谦虚地面对自己，也面对这个世界。

梦想的最初

以书结缘，与邓伟相识已经十年有余，最初接触的是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邓伟眼中的世界名人》画册，以及《我眼中的世界名人——邓伟日记》，很快又被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世界名人肖像展”震撼，使我有更深地了解他、写作他的想法。当然吸引我的还有，能拍出这样精美人像的邓伟，竟然有着一双孩子般单纯与澄澈的眼睛。相对于镜头的准确利落，我甚至觉得他的言语表述有些“笨”。我那时好奇的是，这么一个嘴拙之人，何以说服那么多素不相识而又声名显赫的人允许他拍摄呢？因为我后来知道，就连说过吃了蛋何必看下蛋的鸡的钱钟书，也进入了他的中国文化人拍摄系列，这一切的最初，是怎么达成的呢？

当年的采访文章，在今天的网络上已经找不到了。但如果让我回想，我依旧能说出当时他告诉我的一部分：萌生了拍100个世界名人的计划，他便一笔一画地写信，寄出，然后等待；四年之后，他等来的第一封回信是一个失败的消息：香港船王包玉刚不同意他来拍摄。但这显然没有打击到他，1990年，他仍带着这样的梦想，去了英国。

我后来才慢慢意识到，一个书媒人采访邓伟，实际上是多么徒劳的事情。因为所有的这些细节，都被他记在了日记中。以他特有的摄影师笔法：准确、精练、只叙述不抒情。而通过他嘴中表达出来的，一点不比日记中多多少。但我仍然愿意一次次听他讲，并且在自己的头脑中幻化成一幅幅画面。

我想象着，乍到英国的邓伟，如何在一间租金仅35英镑的蜗居中开始学着异国生存。那个房子太小了，以至于他不得不把所有的器材设备包括衣服都搁在朋友那里。那双梦想着拿照相机的手，如何攥着一个几公斤的熨斗，在工厂从早晨6点干到下午6

点。因为干的活儿的种类太多，以至于最后一位雇主聘他时，他已经是一个洗衣、炒菜、整理房间样样出色的佣人了……

比起后来他在摄影世界纵情驰骋的传奇，这些与摄影无关的事情，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，但它仍是感动我的最主要的部分。无数次面对邓伟，我都会想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，

原本都是有一个梦的，但我们的梦，在坚硬的现实之中变成泡沫。或许并不是现实之墙太坚固，而是我们自己不够坚韧——记得很多年前，有次聊天，我多多少少流露出想到异域一看的想法。“不多，哪怕一个月。”他听了并不打击我，而是说：那你英语必须过关。时隔这么多年，眼看着我的英文一天天地烂下去，我就知道，一个人想要成就什么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

而我又必须说，即使最初的梦想很纯真，后来也多少有些实现，但到最后，仍然能保持梦想的纯度，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。这么多年，我有幸同时也不幸地看到，许多奋斗成名的人，再不是我最初见到的那种眼神与表情，他们开始为名气所累，或者已经意识到，名气可以为他们换取什么，心有杂念，眼神就开始变得浮泛而游移。而我每次见到的邓伟，仍然可以让我见面就说出：你还是没变啊。

他会客气地回应：哪儿哪儿。这都过去很多年了。你当然可以说，时间是把杀猪刀，一个人怎么可能绝对的没变呢？这里我指的是他的眼神以及他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。而我偏又处于成熟与改变之中，所以有时见面，竟然也挑衅地问他：为什么你的镜头只对准美好的东西。我知道有的摄影师，



伦敦印象——伦敦地标大笨钟（邓伟作品）

专拍垃圾场也拍得天下知名；有的专挑废弃的工厂拍摄，原生态的镜头后是另一种摄影观念在支撑，我其实想问的是：这么多年，难道你的摄影观念一点没变？那时候，我的眼前正放着他新出版的一本《中国美术馆馆藏邓伟捐赠作品集》以及《邓伟文集——门，轻轻地敲》。

他听了有些孩子气地着急，以为我指的是他的观念落后。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他举了自己一幅作品《时刻表》。那是他参加中国举办的《艺术与科学国际美术展》的入选作品，表现的是英国东部的老火车站。它早已经弃置不用，现在被装饰一新，用做旅游者的怀旧体验。作为旅游者邓伟到达那里，早上离开，晚上返回。一来一往间，他拍下了两个内容，一个是挂在墙上的老时刻表，另一个是带着板擦印儿的广告牌。将这两个细节解释给我，邓伟说，我想表达的意义是：时间是最公正的刻度，但相对于每个人的内容又各个不同，那些改变人生的细节也许就昭示在这张广告牌上，或许只是一次失物招领、或许只是一张寻人启事……

他还特别向我解释：这张照片显示了特别的制作工艺：数码打印，打印材质是中国宣纸。中国式的镜框托裱方式，四周用四枚银色不锈钢钉固定。

是中西文化的结合，利用了公告牌板擦印儿的水墨效果。另外一幅《伦敦印象》，完全是印象派的拍摄法，记录的是他对居住十七八年的城市的理解。

但是，显然，他对我所列举的那些观念摄影师，有着他自己的看法。他的答案像信仰本身一样简单：“我只拍我感兴趣的人与物，他们在重大事件中发挥过作用，他们的作为也曾感动过我。”“我不愿自己的镜头表现丑陋，也不愿花精力在一些引起心灵负面震撼的人。”“我的生活中也常被丑陋包围，但不好的东西伤我一个人就够了，干吗还要再伤别人？”

记起这些问答的瞬间，我用的是上网检索。这曾是我2007年的一篇采访，做到版上的标题，其实已经代表了我对他人与作品的进一步认识：《邓伟：慢慢地学会幽默》。

有时，一个认真的人，很可能是本性上无法幽默的人。而我竟然在邓伟的一幅幅伦敦作品中看到了幽默。我想，并不是他骨子里有了幽默，而是他用心地体味这座城市，从中看出了幽默。这些幽默的伦敦作品，恰好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期间，对我所主持的英伦文化版面起了点睛作用。而使我感动的是，他那时事务颇多，又有赴墨西哥拍摄计划。但是在启程前，他仍然如我所要求的那样，从他海量的照片里为我挑选出恰题的图片，并认真地写了图片说明。如果将它们连缀，同样是一篇有关英国人的好文章，但我当时想到他的摄影家身份，还是把它们做了图片说明。

“你按你的想法来。”他其实很尊重一位报社编辑的版面要求，但我每每将刊载他的文章、摄影作品的样报拿给他时，出于艺术家的敏感，他仍能点出某些版面处理上的不足。有一次，正吃着饭，他拿起一张白纸，开始在上面画版式。只将某个图的位置调换了一下，整个版就舒朗多了。放下笔，他说了句：“密不透风，疏能跑马。”我知道，他是把当年跟李可染先生学画的功力用在了版面处理上。当然，这对他只是小菜一碟。

世上总有些事，是不能学会的

邓伟的书中，我最喜欢的是与李可染有关的

《学画记》。李可染先生是引领他走上艺术之路的恩师，对于恩师的怀念，他说过一句，一直让我铭记在心：“我在心里不断向他（指李可染先生，编者注）鞠躬，在国外，我向东叩首；在北京，我向西叩首。”

对人有诚意，是邓伟最本真的地方。所以即使光环很多，仍然让人愿意引他为友。

这种诚意还包括，你和他约见面，永远不会担心他迟到。若是你早来，他到后一定会看看表，再次审视下自己是不是来晚。像我这样拿起相机给人拍照，能把对方气得半死的摄影外行，若有天心血来潮，问起摄影方面的傻瓜问题，他也会一板一眼给我解释，条件允许的话，他甚至当面演示。

而他日记中所记的某些与人交往的细节，如果你从诚意这方面来理解，有的时候会觉得他，实诚得出奇。那本名为《北京人》的摄影书，是他花三个月时间整天钻胡同入高楼拍出的数个北京人面孔。日记中有段说他如何和胡同里的老百姓套磁，可能侃得太投入意向太明确，有个人感叹了一句：你可真有耐心啊。这话我怎么想来怎么逗，甚至连那说话的表情都想象得出来。

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级摄影师了，让人想象不到的是，你问到他问题，他仍然还会鼻尖冒汗，一副快速抢答、很想让你满意的急促。所以，有一年听到他获得希腊一个面向全世界顶尖文化人的荣誉奖项——希腊索菲奖时，我就在想，这么一个一紧张就鼻尖冒汗的中国男人，到底是如何站在希腊那个著名的世界戏剧圣地——德尔斐古剧场的领奖台上的呢？还穿着非常正式的西装。因为，他曾亲口告诉我，这么多年，他从来不会打西装领带。因此对他来说，每次出席正式场合，请人帮忙打领带，是他最费神的一件事。

国内有那种一拉得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忍不住问他。他被问得认真劲上来了，那不是糊弄吗？我不习惯。我还是要每次戴完再摘下来，下次重新打。那在英国你一般找谁打？英国裁缝铺的人最合适。他们有的甚至还能认出我呢。嘿嘿。既然这么认真，那就认真地学一下，不就结了？你可是敲开世界文化名人的门的门的人呐，难的事都拿下了，打领

带这么简单的事儿怎么就学不会办不成？但他回了一句，人不能样样学会，总有些事是不能学会的。这样才能给你一个感谢别人的机会，对吧？

大雪天的开始，大雪天的离去

2013年2月5日早晨，八点，八宝山的莲花厅，邓伟的家属为他举行了低调的遗体告别仪式。那天奇寒，天降大雪，我起了个大早见他最后一面。我注意到，在这大雪纷飞天为他送行的，还有一些电影学院82级的同学：张艺谋、顾长卫等。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在留言册上写的是：邓伟，我们天堂见。

2002年，电影学院82级20年聚会，邓伟曾为我当时主持的“名家”版面写了《光阴的故事》一篇文章，记述当时聚会的情形，他可真是好记性，并且有超强的现场观察与摹写能力，至今我还留存着这份样报，它的结尾是：

“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……”一首歌里这么唱着。亲爱的同学们，让我们在心中珍藏起彼此年轻时的容颜慢慢老去，让我们互道珍重快乐地生活吧。

这曾经人才辈出的82级电影人，不知有没有再举行30年聚会，但可能他们谁也没想到，在那次聚会十年后的转年开始，这个独自走上摄影路到世界打拼的同学，就这么猝然离世。

而仅仅是去年的6月，我们的那次见面，我还问他：你将来老了怎么办？我指的是，他漂泊半生，至今仍是孑然一身，对晚年会有什么考虑，他当时不假思索地答：进养老院。

老天没有让他做这样的选择。老天最终把他留在生他养他的中国。老天是在怜惜他做事太执著、太不惜命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他没完成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奥运会后到中美洲拍摄的照片文字还没来得及整理出来……

八宝山莲花厅的告别，前前后后只有半小时，之后他就向天堂去了。同样是这么个雪天，张艺谋



梁漱溟（邓伟作品）

的文章中曾提到，当年他也曾经在这样的天气艰难地行走，被问到为什么，他说，我要锻炼自己的体魄与意志。我要开始做一件事了。

ONE LIFE, ONE GOAL（一辈子一个目标），这曾经是邓伟国外为生计打拼的时代，一位叫达叔的华人移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，现在也可以以此概括他的一生。在确知他离世的消息时，我搜到了自己曾经写过的一条与他有关的微博，我把它再次转发出来：

对于一个四处游走的摄影家，邓伟总是被问到：很多年后，你拍的人都已逝去，这些照片还有什么价值？读他最新一本摄影集《中国人》，我想替他作答：时间自会显出它应有的价值。我们已经看不到梁漱溟与聂绀弩这样的人了，但是望向他们独特的身姿，就似乎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会在许多人心中变得如此重要。

走好，邓伟！

（转载自《北京晚报》2013年2月16日）